第 34 卷第 4 期
2004 年 7 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4, No.4
Jul. 2004

民族间农民婚嫁行为变迁的比较研究

——来自湖北 432 户农户家庭的调查

史清华[1]，黎东升[2]

(1.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2.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研究发现,湖北农户家庭人口年龄分布呈现一种典型的"M"型,这预示着在未来 10—20 年湖北农村会有一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新的生育高峰对未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程度明显要较上一高峰小得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婚嫁行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初婚嫁年龄明显反弹,婚姻倾度显著增大,通婚半径也相应加长。尽管这一结论在民族间、村落间有些差异,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导致农民婚嫁行为变化的根源主要来自农村教育的普及。

[关键词] 农民; 婚嫁行为; 婚姻倾度; 婚姻圈; 湖北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4)04 - 0092 - 09

为了进一步探索农户家庭婚嫁行为,笔者在对浙江和山西农户调查的基础上[1][2][3],依托湖北农学院的三十多名二三年级本科生,在湖北全省组织了一次农户家庭社会行为调查。调查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布置,面的调查以学生来源为基础,采取随机调查形式,每个学生负责调查 5—7 户;点的调查以村为单元,以了解鄂西土家族、苗族为重心,重点调查了恩施自治州的利川市团堡乡黄泥坡村和土桥村、咸丰县小村乡的小村、宜昌市五峰自治县采花乡的辽叶池村与任和坪乡的杨家墒村等 5 个村①。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学龄(即受教育时间),家庭成年人员的通婚情况、生育情况,家庭决策行为以及生育期望等。现就本次调查婚嫁情况分析如下。

一、被调查者及其家庭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湖北全省 12 个地级市州中的 10 个(鄂州和黄石市缺),涉及县(市、区)20 个,乡镇 43 个,村 69 个;共调查农户 418 户,其中五个民族村 263 户。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汉族 156 户,土家族 217 户,苗族 44 户,回族 1 户,其中五个民族村,汉族户 20 户,土家族 205 户,苗族 37 户。样本户的区位分布为:山区 64.86%,丘陵区 23.10%,平原区 12.04%。其中面上调查的分布为:山区 20.13%,

[收稿日期] 2003 - 03 - 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东西部农户经济发展机理及政府管理行为研究"(70173016)

[作者简介] 1. 史清华(1964 -),男,山西襄垣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户家庭社会经济行为; 2. 黎东升(1964 -),男,湖北京山人,长江大学农经系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管理。

① 五个村庄均处鄂西山区,其中黄泥坡村有农户 51 户,民族户 47 户,调查 34 户;土桥村有农户 77 户,民族户 69 户,调查 63 户;小村有农户 435 户,民族户 390 户,调查 72 户;辽叶池村有农户 400 余户,民族户占 80%,调查 22 户;杨家墒村有农户 300 余户,民族户 60 余户,调查 72 户。

丘陵区 48.32%，平原区 31.54%。样本家庭成员共计 1 707 人，其中男性占 51.08%，男、女性别比为 100:95.76，民族户为 100:95.63。年龄极差以女性最大，达 101 岁，男性为 93 岁。家庭成员平均年龄为 32.26 岁，男性为 32.56 岁，女性为 31.97 岁。民族户分别为 31.97 岁、31.78 岁和 32.18 岁。15—70 岁人口中平均受教育时间为 7.66 年，男性为 8.20 年，女性为 7.08 年，其中民族户分别为 7.62 年、8.00 年和 7.21 年。可见，重男轻女思想不仅在山西和浙江农村存在[2](pp.23-25)[3](pp.23)[4]，在湖北也同样存在，不仅在汉族中存在，在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也一样存在。

(二)年龄分布

从图 1 可见，随着年龄的上升，其样本户家庭成员数量分布呈“M”型。其中，20—24 岁和 45—49 岁分别为“M”型分布的两个峰点，分布量分别为 12.13% 和 9.31%。相比较，第一峰点及相邻两组的分布量远高于第二峰点及其相邻两组，极差达 8.14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意味着湖北农村在不远的将来将有一个新的生育高峰到来。就民族间差异看，苗、汉两族家庭成员年龄的“M”型分布要较土家族更为典型，而土家族的分布则更像是一个不规则的“∩”型。就苗、汉成员分布比较看，苗族的分布较汉族明显偏左，即两个人口峰点均较汉族年龄偏小。对于“M”型分布形成原因，笔者在研究浙江农户时曾做过尝试性分析[3](pp.2-3)[4]，原因有三：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推行的计生政策；二是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求一度增加；三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导致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而民族间分布差异的形成则主要是民族间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当然民族户居住条件偏近山区，受生存条件影响，整体预期寿命偏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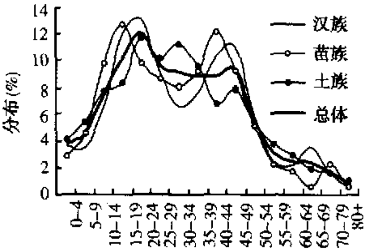

图 1　被调查者家庭成员的年龄分布

(三)年龄与文化交叉分布

就年龄在 15—70 岁的家庭成员受教育时间分布看，其总体呈正态状。在全部样本中，受教育时间在 7—9 年的分布最多，达 40.39%，其次为 4—6 年，为 25.13%，再次为 10—12 年，占 17.13%，受教育时间超过 13 年的占 5.54%，而不足 3 年的占 11.81%，其中未受教育的占 5.54%。就性别看，新一代女性成员尽管在受教育时间上依然较男性短，但差距明显缩小。这一方面表明新一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的重男轻女式的歧视性教育模式有了较大改观。就民族间差异看，汉族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时间较土家族、苗族略长，新一代家庭成员的“普九”教育程度也相对高于民族户。这一结果表明，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的民族子女教育问题需要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二、初婚嫁年龄

(一)样本资料情况

婚嫁问题是研究农民组织内部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本次调查中，婚嫁问题中的初婚(嫁)年龄、距离是作为核心内容进行的。在调查的 418 个农户中，共获取家庭成年成员中有关初婚嫁年龄的样本 1 046 个，其中男性样本 501 个，女性 545 个；男婚样本 473 个，男嫁(倒插门)28 个，女嫁 514 个，女婚(招女婿)31 个。

(二)婚嫁类型分布

从统计结果看,农民的婚嫁类型主体模式为传统的"男婚女嫁",占总样本的94.36%,而"男嫁女婚"模式占5.64%。在婚嫁模式选择上,不同民族间选择程度有一定差异,"男婚女嫁"模式在汉族户中表现最为突出,其比例高达98.83%,而在民族户中则有所弱化。相比较,土家族户中的"男嫁女婚"比例最高,达9.71%,苗族户次之,为3.88%;汉族户最低,为1.17%。就五个民族村的情况看,汉族户均为传统的"男婚女嫁"模式,而土、苗两族则分别有10.27%和4.60%为"男嫁女婚"模式。这一结果表明:受人文因素影响,民族间的婚嫁行为有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在婚嫁模式选择上存在,在初婚嫁年龄、婚姻倾度以及婚姻圈等方面也有表现。

(三)初婚嫁年龄

农民的初婚嫁年龄受性别、婚嫁类型、民族以及居住地等影响(表1)。男性的初婚嫁年龄要明显高于女性,入赘或倒插门的男性初嫁年龄要高于正常男性初婚年龄,而招女婿的女性初婚年龄一般要低于正常女性初嫁年龄。这一结论在其他民族内的表现也基本一致。

表1 不同民族不同村庄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婚嫁年龄 单位:岁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婚	男嫁	总体	女婚	女嫁
汉族	22.52	23.51	23.50	25.00	21.63	21.61	22.67
苗族	21.85	22.78	22.78	23.00	20.94	20.96	20.50
土家族	22.41	23.55	23.43	24.67	21.37	21.38	21.27
总体	22.40	23.46	23.39	24.57	21.43	21.44	21.35

受婚嫁观念以及婚姻政策的变化影响,农民的初婚嫁年龄有明显差异(表2)。总的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湖北农民的初婚嫁年龄呈现一种"∩"趋势。初婚嫁年龄最早的为解放初结婚的一代,平均只有19.21岁,最晚的为20世纪70年代结婚的一代,平均为22.82岁,相差3.6岁。20世纪70年代后婚嫁年龄有明显提早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结婚的一代,平均婚嫁年龄已提早到22.46岁。尽管这一变化幅度不大,但趋势却甚为明显。就性别看,男性婚嫁较女性整整提早了一代(10岁)。具体到不同民族成员看,20世纪70年代后,汉族农民初婚嫁提早趋势较为明显,而民族户中苗族和土家族则呈推后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建国后新《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使早婚现象得到有效遏止;二是媒体不断发达,信息传播广泛,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婚嫁观念,使民族间的初婚嫁时间趋向一致化。

表2 不同年龄组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婚嫁年龄 单位:岁

	总体	男性婚嫁				女性婚嫁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20-29	22.46	23.31	23.12	22.83	23.55	21.90	21.90	21.33	21.98
30-39	22.53	23.48	23.77	22.13	23.58	21.68	21.93	20.73	21.68
40-49	22.77	23.52	23.69	23.53	23.30	21.99	22.23	21.83	21.77
50-59	22.82	24.14	23.59	22.86	24.89	21.16	21.67	19.83	21.09
60-69	20.85	22.47	22.57	21.00	22.67	19.55	19.24	21.00	19.83
70+	19.21	21.93	23.63	23.00	19.50	17.05	18.29	17.67	15.89
总体	22.40	23.46	23.51	22.78	23.55	21.43	21.63	20.94	21.37

从婚嫁行为与受教育时间的关系看(表3),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多,农民的初婚嫁年龄呈显著

推后趋势，这一趋势无论在性别间还是在各个民族间，无论是整个样本还是五个民族村样本，均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结果预示着要想全面推行《婚姻法》中的晚婚晚育政策，加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非常重要。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强制推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所以取得一定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农村的基础教育普及程度提高有关。

表3　不同受教育时间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婚嫁年龄　　单位：岁

	总体	男性婚嫁				女性婚嫁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0-3	20.31	21.45	22.17	20.60	20.86	19.83	20.37	19.00	19.31
4-6	22.30	23.14	23.73	23.00	22.75	21.70	21.86	21.50	21.63
7-9	23.00	23.77	23.31	23.00	24.26	22.03	22.36	21.00	21.98
10-12	23.44	24.37	24.56	23.10	24.48	21.92	21.94	21.33	22.03
13+	23.16	23.20	20.50	23.00	23.83	23.11	22.75	23.00	24.33
总体	22.41	23.46	23.52	22.78	23.55	21.44	21.63	20.94	21.37

就五个民族村的情况看，教育对农户家庭成员晚婚的显著性在村际间的表现，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普及农村教育明显有益于晚婚晚育，不同的是晚婚晚育的程度有着明显差异。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农村居民的婚嫁行为变化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教育与其存在着的高度相关性着实不能否认其对农村婚嫁行为的影响。

三、婚姻倾度

（一）样本资料情况

婚姻倾度(marriage gradient)是研究婚嫁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用于测定男女两性初婚嫁年龄差的变化[4](p.399)。为了测定样本户家庭成员的婚姻倾度，我们对调查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筛选出成对婚嫁样本共计476对。其中男婚女嫁型449对，男嫁女婚型27对；汉族193对，苗族49对，土家族233对，回族1对。五个民族村共288对，其中汉族24对，苗族42对，土家族222对。

（二）婚姻倾度及分布

1. 婚姻倾度。就全部样本看，湖北农民的平均婚姻倾度为1.75岁(即男性初婚嫁年龄与女性之差)，其中汉族为1.73岁，苗族为1.82岁，土家族为1.74岁。比较而言，汉民族的婚姻倾度最小，苗族最大，土家族居中。从年龄看，随着时代的变迁，男性选择伴侣的婚姻倾度呈“U”趋势，而女性则呈下降趋势(图2)。就婚嫁类型看，不同婚嫁类型的婚姻倾度也有差异，传统的“男婚女嫁”模式的婚姻倾度较小，仅1.70岁，而“女婚男嫁”模式的婚姻倾度则较大，为2.56岁。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女性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龄相近的男性做伴侣，而男性则趋向选择较自己更为年轻的女性做伴侣。在农家严重缺乏男性时，招女婿模式的婚姻倾度显著增高。婚姻倾度的大小与农民接受的文化教育时间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婚姻倾度明显增大，受教育时间不足3年，男性与女性的婚姻倾度分别为1.16岁和1.25岁，在4—6年之间，分别为1.90岁和1.79岁，在6—9年之间分别为1.67岁和1.82岁，超过9年则分别为2.05岁和2.33岁。婚姻倾度的变化同时也与地域文化相关，在被调查的五个民族村中，村际间的差异相当明显。婚姻倾度平均为1.66岁，其中黄泥坡1.07岁，辽叶池1.83岁，土桥1.34岁，小村2.00岁，杨家塝1.88岁，极差近1岁。

2. 不同民族与村落婚姻倾度分布。从表4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成对婚嫁样本中，婚姻倾度

为零(即男女同龄婚嫁)的样本仅占总样本的15.13%,婚姻倾度为负值(女性年龄大于男性)的占9.45%,而婚姻倾度为正值(男性年龄高于女性)的则占到75.42%。这表明:在目前农村中,有婚姻倾度的婚嫁行为是农民选择婚嫁的主体行为,表现为男性初婚嫁年龄普遍高于女性。民族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婚姻倾度行为最突出的是土家族,其次是汉族,再次是苗族。同样,村际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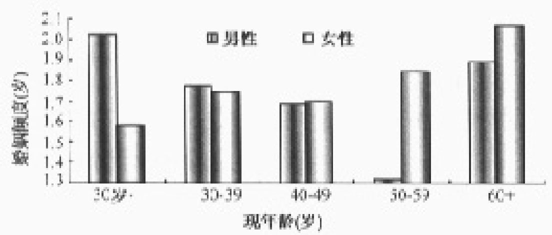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年龄成员的婚姻倾度

表4　不同民族与村落婚姻倾度分布　　单位:%

	女性大于男性			男女	男性大于女性						
	3岁+	2	1	同龄	1	2	3	4	5	6	7+
汉族	1.04	4.15	3.11	16.06	21.76	25.39	13.99	7.25	3.11	2.59	1.55
苗族	-	6.12	4.08	18.37	16.33	16.33	20.41	10.20	2.04	6.12	-
土家族	1.29	3.86	5.15	13.73	16.31	30.90	16.74	6.01	3.43	0.43	2.15
总体	1.05	4.20	4.20	15.13	18.49	27.10	15.97	7.14	3.15	1.89	1.68

3. 不同性别与年龄的婚姻倾度分布。受时代变迁影响,不同时代、不同性别成员的婚嫁行为并不相同(表5)。就婚姻倾度看,随着时代变迁,男性选择偏小女性的分布呈现一种"∪"趋势,老的一代与年轻的一代婚姻倾度分布相对高于现年龄在30—49岁的成员。婚姻倾度在2岁的分布量最多,其次是1岁和3岁。在选择同龄婚嫁或偏大女性的分布上,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趋势。与此相对,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选择偏大男性的分布呈现一种扩大趋势,选择同龄婚嫁的分布同样呈一种"∩"趋势,选择男性偏小的分布则呈现一种下降趋势。这一结果表明:在婚嫁行为的选择上,女性对婚姻倾度的要求明显要高于男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呈强化趋势。

表5　不同性别与年龄的婚姻倾度分布　　单位:%

	女性大于男性			男女	男性大于女性						
	3岁+	2	1	同龄	1	2	3	4	5	6	7+
男性的婚姻倾度分布											
20—29	-	3.95	2.63	15.79	21.05	32.89	14.47	7.89	1.32	-	-
30—39	1.47	2.21	5.88	19.85	17.65	22.06	15.44	7.35	3.68	2.21	2.21
40—49	0.67	6.71	4.03	14.09	17.45	26.85	16.11	7.38	2.68	2.68	1.34
50—59	-	4.05	4.05	10.81	16.22	32.43	22.97	4.05	4.05	-	1.35
60+	4.88	2.44	2.44	9.76	24.39	24.39	7.32	9.76	4.88	4.88	4.88
总体	1.05	4.20	4.20	15.13	18.49	27.10	15.97	7.14	3.15	1.89	1.68
女性的婚姻倾度分布											
20—29	-	3.13	2.08	12.50	18.75	30.21	16.67	11.46	3.13	-	2.08
30—39	1.39	1.39	4.17	18.75	19.44	27.08	14.58	5.56	2.08	3.47	2.08
40—49	0.71	4.26	5.67	14.89	17.02	24.11	21.28	5.67	4.96	1.42	-
50—59	-	11.86	5.08	13.56	15.25	33.90	10.17	8.47	-	-	1.69
60+	5.56	5.56	2.78	11.11	25.00	19.44	8.33	5.56	5.56	5.56	5.56
总体	1.05	4.20	4.20	15.13	18.49	27.10	15.97	7.14	3.15	1.89	1.68

4. 不同性别与受教育时间的婚姻倾度分布。同样,教育与婚嫁行为也密切相关(表6)。随着

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婚姻倾度均呈扩大趋势，且扩大程度上女性胜于男性。对男性来说，无论受教育时间多长，其婚姻倾度分布量均不超过2岁的范围，而女性则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多，到10年后，婚姻倾度集中程度最高点则由2岁上升到3岁。在同龄婚嫁选择上，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上升，男女均一样呈现一种“U”趋势，选择伴侣偏小的分布则均呈现一种缩小趋势。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加强教育不仅会影响农民的初婚嫁年龄，同时也会影响婚姻倾度。

表6　不同性别与受教育时间的婚姻倾度分布　　单位：%

	女性大于男性			男女	男性大于女性						
	3岁+	2	1	同龄	1	2	3	4	5	6	7+
男性的婚姻倾度分布											
0-3	5.88	9.80	3.92	13.73	17.65	33.33	5.88	5.8	8	--	3.92
4-6	-	2.40	4.00	14.40	21.60	28.00	15.20	5.60	4.00	2.40	2.40
7-9	0.48	3.38	4.83	18.36	19.32	25.60	16.43	6.28	2.42	1.45	1.45
10+	1.08	5.38	3.23	9.68	12.90	25.81	21.51	11.83	5.38	3.23	-
总体	1.05	4.20	4.20	15.13	18.49	27.10	15.97	7.14	3.15	1.89	1.68
女性的婚姻倾度分布											
0-3	3.09	9.28	4.12	15.46	18.56	32.99	9.28	2.06	1.03	1.03	3.09
4-6	-	2.37	4.14	16.57	21.89	27.22	13.02	8.28	2.96	2.37	1.18
7-9	1.26	3.14	5.03	16.98	14.47	25.79	19.50	5.66	4.40	1.89	1.89
10+	-	3.92	1.96	3.92	19.61	19.61	27.45	17.65	3.92	1.96	-
总体	1.05	4.20	4.20	15.13	18.49	27.10	15.97	7.14	3.15	1.89	1.68

四、初婚嫁圈

（一）样本资料情况

婚嫁圈（marriage cycle）是研究婚嫁行为的又一个重要指标，主要用于测定男女两性初婚嫁距离的变化。[3]为了测定样本户家庭成员的婚嫁距离，我们对调查资料同样进行了重新整理，筛选出有婚嫁距离的样本共计944个。其中男性样本460个（男婚433个），女性484个（女嫁454个）；汉族355个，苗族103个，土家族484个，回族2个。五个民族村共596个，其中汉族50个，苗族87个，土家族459个。

（二）婚嫁距离

1．不同民族、性别及村落的平均初婚嫁距离。农民的初婚嫁距离同样受性别、婚嫁类型、民族以及居住地等影响（表7）。

表7　不同民族、性别及村落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初婚嫁距离　　单位：km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婚	男嫁	总体	女嫁	女婚
汉族	46.58	47.36	46.50	10.50	45.86	47.80	7.50
苗族	14.39	10.69	18.66	2.00	18.02	11.04	2.00
土家族	23.93	23.42	21.65	41.04	24.41	21.54	48.82
总体	31.88	31.35	31.07	35.89	32.39	31.78	41.57

女性的初婚嫁距离要明显高于男性，入赘或倒插门的男性初嫁距离要高于正常男性，而招女婿的女

性初婚距离一般要低于正常女性。这一结论在不同民族间、区域间的表现均有一定差异。就民族情况看,在汉、苗族占主体的地区,男婚女嫁的婚嫁圈要较女婚男嫁的大,而土家族占主体的地区则相反。就五个民族村的情况看,无论那种类型,其初婚嫁距离均低于样本总体平均数。

2. 不同民族、性别及年龄的平均初婚嫁距离。同样,由于出生时代的不同,婚嫁观念的变化,农民的初婚嫁距离也有明显差异(表8)。总的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初婚嫁距离呈现"∩"趋势。初婚嫁距离最短为解放初结婚的一代,平均只有11.25km,最长的为20世纪80年代结婚的一代,平均为54.50km。如果将极端值剔除,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交际圈的扩大,农民的初婚嫁圈在增大。这一趋势不只在样本总体上有表现,在五个民族村以及各民族间也一样。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时代变迁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婚嫁行为。尽管这一变化相当缓慢,特别是在民族聚居区,但其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到某个村落,这一趋势变化则有所差异,个别村落受居住条件、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传统观念等影响,村民的婚嫁圈有缩小的趋势,诸如本次调查的黄泥坡村。这一结果表明:婚嫁圈的扩大已成为农民婚嫁行为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

表8 不同年龄、性别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初婚嫁距离 单位:km

	总体	男性婚嫁				女性婚嫁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20—29	44.86	38.41	46.79	19.92	34.634	9.16	45.16	58.78	50.77
30—39	54.50	56.75	168.22	7.40	24.25	52.38	123.65	9.17	23.61
40—49	15.96	17.83	10.78	11.34	22.74	13.98	13.94	10.78	10.83
50—59	14.15	15.08	15.35	9.57	15.93	12.96	10.95	7.25	15.34
60+	11.25	12.38	9.97	8.00	15.43	10.24	9.80	8.25	11.10

3. 不同民族、性别及受教育时间的平均初婚嫁距离。从婚嫁行为与受教育时间的关系看,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多,农民的初婚嫁圈呈显著扩大趋势。受教育时间不足3年者,平均初婚嫁距离仅为8.39km;受教育时间延长至4—6年,婚嫁距离将扩大到15.06km;进一步延长到7—9年时,则扩大到28.93km;当达到10年及以上时,则增大至95.60km。这一趋势无论在性别间,还是在各个民族中,无论是整个样本,还是五个民族村样本,均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很明显,这一结果为我们寻找人类婚嫁行为变迁提供了一个基本根源,即教育是改变人类婚嫁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或手段。

(三)通婚圈的大小及变化

1. 通婚圈与民族及性别的关系。从表9可以看出,农民的通婚距离分布表现为一种正态状,其分布最集中的距离为3—5km,集中程度为23.41%,其次为5—10km,为21.19%。通婚圈半径在5km以内的样本占总样本的43.65%,10km以内的占64.84%,在20km以内的占82.74%,超过50km的占6.36%。就民族间比较看,汉族与土家族的分布趋势相对一致,最集中的距离均在3—5km间,集中程度汉族为24.23%,土家族为22.11%;苗族的最集中分布距离则在5—10km之间,分布量也高达31.07%。通婚半径在5km以内,分布量以汉族最高,达46.76%,其次为土家族,为42.56%,苗族最少,为38.83%;通婚半径在10km以内,分布量则以苗族最高,达69.90%,其次为汉族,为66.48%,土家族最少,为62.81%;通婚半径在20km以内,分布量是以苗族最高,达87.38%,其次为土家族,为82.44%,汉族最少,为82.25%;通婚半径超过50 km的分布,则以土家族最多,达7.02%,汉族次之,为5.35%,苗族最少,为4.85%。就性别看,男女通婚在不同距离上的分布总趋势完全一致,只不过在某个区间分布集中程度上略有差异。男性婚嫁距离分布较女性偏近。5km之内,男性的分布量为44.13%,而女性为43.18%,10km之内的分布量分别为65.22%和64.46%,到20km之内两者之间基本达到一致,分布量分别为83.26%和83.23%。超过50km的

分布则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分布量分别为6.09%和6.61%。可见，通婚圈的大小与民族间的习惯、通婚者的性别等因素非常相关。

表9　不同民族与性别的平均初婚嫁距离分布　单位：%

	总体	男性婚嫁				女性婚嫁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总体	汉族	苗族	土家族
≤1km	6.57	6.74	5.29	3.92	8.40	6.40	5.41	3.85	7.72
1-3	13.67	13.48	17.06	7.84	12.18	13.84	17.30	7.69	12.60
3-5	23.41	23.91	24.71	27.45	22.69	22.93	23.78	26.92	21.54
5-10	21.19	21.09	20.00	31.37	19.75	21.28	19.46	30.77	20.73
10-20	17.90	18.04	15.89	17.64	19.74	17.77	15.68	17.31	19.52
20-50	10.91	10.65	11.77	7.84	10.50	11.16	12.97	7.70	10.57
50-100	3.71	3.70	2.35	3.92	4.62	3.72	2.16	3.85	4.88
100+	2.65	2.39	2.94	0.00	2.10	2.89	3.24	1.92	2.44

2. 通婚圈与通婚者的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从表10可见，在一定的通婚距离内，通婚量的变化明显随年龄增大而呈"∩"趋势。通婚半径在10km以内，其样本集中程度随着年龄增长呈"∩"趋势；在10—20km之间呈上升趋势；到20km以外，则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通婚圈的变迁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受社会发展影响，年轻一代通婚圈明显呈扩大趋势。

就通婚者的通婚圈与受教育时间长短关系看，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多，通婚圈呈显著扩大趋势。受教育时间超过10年与受教育时间不足3年比较，在3km内选择婚姻伴侣的分布量分别为12.24%和20.80%，两者相差达8.56个百分点，在5km之内，相差20.42个百分点，在20km以外，相差25.2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村教育普及不仅让农民增长了见识，还显著扩大了农民的交际圈与婚姻圈，使农民的婚嫁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表10　不同年龄及受教育程度者的平均初婚嫁距离分布　单位：%

	年龄(岁)					受教育时间(年)			
	20-29	30-39	40-49	50-59	60+	0-3	4-6	7-9	10+
≤1km	4.00	6.16	9.26	8.96	1.12	6.71	4.21	9.64	3.40
1-3	12.00	14.86	13.33	15.67	11.24	14.09	18.95	11.29	8.84
3-5	27.43	21.74	26.67	17.16	20.22	28.19	24.56	23.42	16.33
5-10	14.86	24.64	20.00	23.88	22.47	22.15	21.05	19.83	23.81
10-20	14.28	18.11	15.93	14.93	34.83	22.15	17.89	17.08	15.64
20-50	12.57	9.421	0.37	14.18	8.99	6.71	10.88	11.29	14.28
50-100	8.57	2.17	2.59	4.48	1.12	-	1.40	4.13	10.88
100+	6.29	2.90	1.85	0.75	-	-	1.05	3.31	6.80

五、结论性评述

(1)从湖北四百多户农户点(村)面调查结果看，随着农户家庭成员年龄的上升，成员数量分布与山西和浙江一样，均呈"M"型，但这一分布在不同民族间有些差异，土家族的分布更类似于"∩"型。农户家庭成员的这一分布预示着在未来10—20年，内湖北农村同样会遇到一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

(2)随着时代变迁，农民的平均初婚嫁年龄总体呈推后趋势，但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明显的反弹，特别是男性婚嫁反弹尤其显著。影响农民初婚嫁年龄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自然区位、人文教育等。特别是教育对农民的婚嫁行为影响非常显著，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加长，农民初婚嫁年

龄明显向后推移,这一结论不只在汉族户中有所体现,在其他民族户中也一样存在。

(3)农民的婚嫁行为中,存在着明显的婚姻倾度,且随着时代变迁总体呈“U”趋势。男性婚嫁的倾度偏好明显高于女性,“男嫁女婚”型的倾度偏好要高于“男婚女嫁”型,民族户的倾度偏好要高于汉族户。同样,农民受教育时间的加长,与婚姻倾度增大趋势成正比。

(4)随着时代变迁,农民的通婚圈总体呈扩大趋势。相比较,女性的通婚圈要较男性大,汉民族要较其他民族户大。教育是影响通婚圈大小的一个主要因素。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加长,通婚圈明显扩大。同时,自然经济区位也十分重要,受其影响,村际间初婚嫁距离分布差异明显。

(5)总体来看,农民的婚嫁行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初婚嫁年龄的反弹,婚姻倾度的扩大,通婚半径的延长等方面。教育在婚嫁行为变迁中的明显作用预示着: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加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对农村基础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达,不只影响农民的初婚嫁年龄、婚姻倾度偏好,还影响到农民的通婚圈大小,确切地说,是影响着农民自然素质的提高。可见,推进农村基础教育,将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经济行为的变化。

[参 考 文 献]

[1] 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 史清华.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3] 史清华.浙江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1,(4):44-54.

[4] (美)David Popenoe.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Behavior of Ethnic Peasant Marriages in Hubei Province

SHI Qing-hua[1], LI Dong-she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2.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To further our study on the marriage behavior of rural areas, I organized more than 30 undergraduate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rural family behavior in Hubei Province during the winter vocation in Zhejiang and Shanxi provinces in 2002. The general survey is based on the random samples obtained by students, while the spot survey is based on 5 minority villages of the western Hubei, covering 432 cases. The data of more than four hundreds rural households in Hubei suggest that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Hubei households changes on a model of "M", and so it is in Zhejiang. This result indicates a population bearing pinnacle in the future 10 - 20 years, but the new pinnacle working on the fast growth of population is less than the past one. As time changes, and education increases, the behavior of peasant marriages is obviously changed. The marriage age is obviously younger and the marriage gradient bigger. The radius of the marry circle is also increased. Although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alities and villages, the basic direction is consistent. The marriage behavior of peasants changes with the level of rural education. It can be positively said that to enhance basic r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hang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y.

Key words: peasants; marriage behavior; marriage gradient; marriage circle; Hubei